第一章
西藏和平解放前的旅游活动

第一节　古代西藏旅游活动的产生和发展

一、旅游活动的本质和产生

旅游在本质上是这样一种活动：其主体在时空上的位移过程。这就是说，没有活动的主体在时空上的位移，就一定没有旅游活动；但有了这种位移，不一定就是旅游。这与它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而逐渐展开和紧缩，是密不可分的。根据这个观点，那种认为“旅游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自古以来就客观地存在”，“它开始是以少数特权阶级以享乐为目的而进行的旅游活动”① 是错误的观点。位移最早发生于人类的迁徙，随后，它附带上各种不同领域的任务进行，如由于军事征战、外交、经商、宗教朝圣

① 蔡雄主编：《旅游基础教程》，中国人事出版社，1989年，第2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等活动而发生的主体位移。随着历史的发展，各领域的强度发生差异，旅游活动逐步展开，主体位移逐渐放弃附带的任务，而缩减为纯粹以审美为主要特征的一定时空中的单一位移，这就是现代旅游。从主体的角度而言，审美享受成为现代旅游最主要的目的，而任务特征，其重要性虽仍占一定的比例，但审美的比例已大大提高。

旅游活动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源在时空上的差异以及作为活动主体的人为消除差异的需要。资源可以分为生存资源（生活资源和生产资源）、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三类。自然资源是指不直接属于生活资源、生产资源的自然环境，如冰川、地热、河流等；生存资源指与居住者密切相关的社会和自然物质资源，如房屋、牲畜、田地、水源等；文化资源是指人们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创立、发展起来的文化配套体系，它既可以是物质性的，如建筑（庙宇、民居等）、服饰、交通工具、饮食等，也可以是制度性的，如政治制度、宗教制度、经济制度，还可以是精神性的，如宗教、哲学、文学、史学等。本书把它们分为三个资源域，每个域下尚有分域；资源域间会发生差异并导致域间张力，这种张力乃是由于主体的文化属性必然会导致的，如主体从主要依赖自然到自己创立文化设施而相对地较少依赖自然，这就是一个主体文化过程，也是资源域间张力导致的结果。由于本书主要探讨旅游或旅行，所以不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但神话和传说中关于旅游或旅行的描绘，正是这种资源域间差异所致。列维一斯特劳斯在对澳大利亚一则关于半人半兽的祖先神话进行结构分析时，就把它看成是旅行记：“ 该祖先曾出现于某地，沿着某条路线走过，在某处做过那些事情，从而使他成为至今可见的地貌特征的创始

者,最后他在某一个地方停下来或消失了。”①

由于各种资源域在时空域上的差异各不相同，其域上张力不同，因而导致位于不同时空的活动主体产生消除各不相同的差异的需要。如当生存资源发生巨大的时空差异，一地的生存资源贫乏到威胁主体的生存，而别地的生存资源相对丰富，就会导致主体在时空上的迁徙；当由于地理差异的原因，自然资源对于主体而言，本身就具有资源域上的差异并导致吸引力，主体为消除这种差异，满足审美的需要，也会发生时空上的位移；或者当文化资源发生地理上的差异，域上张力过大，主体为了消除这种张力，就会到异文化那里学习并发展自己的文化；这样，大规模、长时段的主体位移，就在不同文化间发生。

因此，不同资源域发生在地理空间上的差异并由此导致域上张力，是主体位移发生的根本原因。

二、古代西藏旅游活动的发端
（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

根据上述观点我们就会发现，古代西藏旅游活动早在史前文明时期就已出现。

从地质学的材料来看，距今 6 亿年 ～2 亿年，前古生代时期，西藏地区是“古地中海”或“特提斯海”的一部分。距今 7000 万年以来的新生代时期，西藏地区结束海洋的历史，并由陆地逐渐向高原演化。距今 4000 万年前，喜马拉雅地区成为一个风光明媚的海湾。距今 3000 万年左右，强烈的地壳运动“喜马拉雅运动”爆发，完成从海洋向陆地的过渡。南部的藏南谷地和喜马拉雅地区成为陆地，不过是在距今 1000 万年到 400 万年

①列维一斯特劳斯著、李幼蒸译：《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第 260 页 ～261 页。

间的事①。近 300 万年左右，西藏高原从海拔 1000 米左右上升到目前的 4500 米～5000 米。而人类的出现，不过就是在这 300 万年间实现的。在考古学上，把这持续了 300 万年以上的时间称为旧石器时代。因此，这是一个与人类同年龄的高原。②在这个过程中，西藏地区有过一段非常适合人类居住的时期，所以有不少学者推断，西藏地区也是人类的摇篮之一。美国人类学家莫菲写道：“生物进化使地球上有了一个人类物种‘智人’，因此人类的遗传基因天赋条件大致相同。由于人类不断迁徙，他们已经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从沙漠到雨林，从热带到冻土地带。”③根据这些看法，在史前这里一定发生过大规模的人类迁徙活动。在藏族神话故事中有不少是反映这个地质变化过程和人类迁徙的。

新中国成立后，在西藏高原上发现了不少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包括苏热地带，其年代大约距今 5 万年左右。多格则和扎布地带，距今约 1 万年。而各地带的石器，年代不会超过 1 万年。④所以当时是有人居住在这些地方的。由于海拔上升，以前适合于人类大规模居住的地方，现在变得相对困难了，生存资源发生在地理空间上的差异导致域上张力，人类只得迁徙到易于居住的地区。而适合于人类居住的河谷地带，如藏南山谷和藏东山谷，就成了后来西藏文明的发源地。

除了地理环境因素外，人口的增长使有限的资源紧张，从而导致人口迁移，也属此类。它的域上张力与上面是一致的，但却

① 张青松等著：《青藏地区上新世古地理和高原隆起》，科学出版社，1981 年；陈国新著：《地学基础手册》，测绘出版社，1984 年，第 177 页～178 页。

② 徐华鑫编著：《西藏自治区地理》，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 年，18 页～22 页。

③ 罗伯特·F·莫菲著、吴玫译：《文化和社会人类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年，第 3 页～4 页。

④ 侯石柱著：《西藏考古大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4 页～22 页。

是人类自身造成。只有人口与生存资源犹如均衡的两极，在一定时空上形成稳定系统，才能达到生态平衡。而二者之间比例失重，造成失衡，人口迁移就成为必然，或者导致技术的改进，用第三类工具系统加以调节。

这些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迁徙，是西藏旅游活动的发端。这一时间段内的位移活动，其最大的特征在于其生存性、被迫性和团体性。

三、古代西藏旅游活动的初步展开
（新石器时代～公元 7 世纪）

进入新石器时代后，人口的迁徙仍然不断进行。不过，导致迁徙的原因已逐渐由生存资源域上张力转移到文化资源域上张力，就是说，由于社会文化的原因导致迁徙的比例上升。

约公元前 2000 年以前，“在印度东部地区的蒙古人种繁衍开来，分布于从北部地区直至整个藏区，又由此不断进入不丹、阿桑、缅甸等地直到南部沿海地区。’① 这是因人口原因发生的迁移。

公元前 2000 年代上半叶，居住在里海周围以至中亚草原的雅利安游牧民族大举向外移民，向东南的一支于公元前 1500 年前后进入印度河河谷。② “人非人或更纳惹人，即后来被藏族称作库奴的人，生活在印度与阿里的接壤地区。传说该地区的人皆天生丽质，大都系雅利安人。”库奴即是昆仑。③

① 更敦群培著、格桑曲批译：《更敦群培文集精要》，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 年，第 24 页～25 页。

② 周启迪主编：《世界上古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166 页～167 页。

③ 《更敦群培文集精要》,第 30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据近期研究者考证，这一时期，青藏高原发生过羌人的迁徙。① 汉文史籍记载：秦厉公时，羌人无弋爰剑西迁。后魏南凉时秃发樊尼西迁，“率众西奔，济黄河，逾积石，于羌中建国，开地千里，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② 藏籍中有：在释迦牟尼出世前，“诤劫最初时间中，嘉色五王子歼灭十八支军团或说十二支军团时，汝巴底王和一支军团交战失败，伪着女装而逃到雪山丛中居住，而发展出的种族，即现今所称的西藏。”③ 由于战争等社会原因而迁移到西藏的人口，他们与西藏早已生衍着的本地人融合，共同成为藏人的祖先。

这一时期以宗教为中心或宗旨的旅行活动逐渐增多，以苯教徒为大宗，而佛教徒开始了最初的游方活动。

苯教祖师辛饶·米沃且活到了 82 岁。在 14 岁时，即于四大洲调伏众生；15 岁～16 岁，应帝释天等的请求，到魏岭等 360 个国度周游，兴建道观；此后，于诸洲各地如“ bod”讲经、驱魔。④据记载，藏史上第一代国王聂赤赞普有子叫木赤赞普，他邀请了以木喀巴等为首的 108 位象雄学者从阿里到雅隆河谷去，向他们礼拜。⑤此后，苯教与政权分合不一，在各地宏扬和衰退不同，从而导致苯教徒或求学或是讲经传教，因此发生大规模的教徒游历活动。

他们为藏文化带来了西方波斯祆教的养分，而其中祆教徒的

① 丹珠昂奔：《藏文化散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 年，第 7 页～24 页

② 《册府元龟）卷九五八（外臣部·国邑）第 20 页。

③ 廓 诺·迅鲁伯著、郭和卿译：《青史》，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5年，第 24 页

④ 杨化群：《西藏苯教祖师辛饶·米沃且的一生》载《拉萨藏学讨论会文选》，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 年。

⑤卡尔梅著，王尧、陈观胜译：《〈苯教史〉（嘉言宝库）选译（一）》，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一集，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270 页。

二元论影响至为明显。① 《青史》上说，藏王拉妥妥日年赞时候，班智达洛生措、译师李铁生两人，将（枳大嘛呢陀罗尼经）和《诸佛菩萨名称经》从印度带来西藏。当时人不懂这些经典，两人只好又回印度去了。② 朗日松赞统治时期，据说从汉地带来了一本医书和天文书，但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目前还弄不清楚。③

随着社会发展，私有观念的出现带来争权夺地，部落内部、部落之间常常发生战争，由此而引发人口的大量迁移。战争通常是跨时空的有组织的位移行为。这就和无组织的、个人行为甚至是被迫的位移行为有了重大的区别。但它所带来的文化融合、部落一体化后果，却多半不如后者，它更机械。西藏本土的各部落，本是分散不成体系的。后来，在生存资源方面，是人口的迁徙；在文化方面，是宗教徒的游历活动，将他们联络起来，形成不少共有特点。随着社会的发展，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增多，商贸游历又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些旅游活动，从根源性方面考虑，我们仍看成是文化资源域上张力所致。因此，他们带来的结果，就是文化信息的交换。文化信息的丰富，使我们看到，文化一体的民族就要形成了。

① 常霞青：《麝香之路上的西藏宗教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45 页～47 页。丹珠昂奔：《藏族神灵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57 页。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 13页。

② （青史》，第 26 页。

③ 日琼仁颇且·甲拜衮桑编著、蔡景峰译：《西藏医学》，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33页。

四、西藏古代旅游活动的大发展时期
（公元 7 世纪～19 世纪）

公元 7 世纪崛起了吐蕃王朝。它一出现，就卷入了周边事务的争端中，这就使得吐蕃王朝的历史很快被用各种文字记录下来。从这时起，经历约十二多个世纪，古代旅游活动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这个大发展，与吐蕃时期的经济发展分不开，也与它介入周边事务以及文化逐渐丰富和精深有关。

根据各个阶段主导的旅游活动内容不同，我们把这段时期分为三个小的阶段。

第一阶段，即吐蕃朝。它的旅游活动以军事征战性的大规模人口迁移为主。据不完全统计，自公元 634 年到 792 年的 158 年间，与吐蕃有关的军事行动就达 44 起，[①] 平均每 3.6年就有一起。频繁的军事活动带来了系列迁徙问题，翻检敦煌吐蕃文献，随处可见吐蕃君臣为准备长途军旅，进行“大料集”，抢夺对方的粮草是第二种解决办法。秋收时节，河西、关陇不少地方成了“吐蕃粮庄”。这些军事行动遍及青藏高原周边，西起中亚，东至唐都长安，东南鞭及云南诸诏，北至敦煌，南涉中印度。不仅开拓了吐蕃疆界，交通路线一时遍布各方，更重要的是它传播了吐蕃文明，也大大增加了与先进文明接触的机会。由于军事行动需要极强的组织性、纪律性，所以对吐蕃来说，它起到了内部整合的作用。

唐蕃之间的友好往来，在两个多世纪间陡然猛增，经常可以见到双方的使节在通道上往来不歇。这种交往是全方位的，而旅游活动便呈现出多样性特征。根据汉藏典籍的记载，大略有如下名目：1. 和亲往来。吐蕃数次派遣使臣到唐朝求婚，唐朝两次

①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 293 页～299页。

将公主嫁到吐蕃；2．官方往来。永泰二年（766年）9月，杨济出使吐蕃返回时，吐蕃派首领论位藏等一百多人随他来到长安，“谢申好也”。① 开元二十八年十二月，“金城公主薨，吐蕃告表，且请和，上不许。”② 还有和盟。公元822年、823年，双方互派使臣会盟于长安和逻些，盟誓立碑。在交往中不少唐使记下了他们到西藏的见闻。刘元鼎使蕃一节，在唐史上就有详细的记载。3．游学、游方讲经。唐蕃交往以后，吐蕃很快就发现唐文明的先进，于是派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③ 唐朝曾一度派汉僧到吐蕃讲经传佛，规定一年一换。 4．人口有组织地迁移。吐蕃占领唐地，为了补充自己境内的人口，就从占领地大量移民过去。

吐蕃主动派人到周边地区学习先进的文化，除了前述事件外，吐蕃王朝初期，有吞弥·桑布扎游学印度，后创制藏文。吐蕃还派人学习佛教，或请僧人到藏地，这在《巴协》中有生动的描述。桑喜等使臣去唐朝求取经书一节，就是一篇比较详细的旅行记④。汉地、印地僧人远道游方或为传教来到吐蕃，以及于阗佛教被破坏后僧人流落到藏区，成为这时期外来僧人的主流。此时佛教徒的远游活动比上一时期大为增加，与后一阶段相比，吐蕃僧人的游历活动，在程度上、规模上或者影响上，都处在一个过渡时期。

吐蕃内部佛苯争斗，胜负时有反复。不断有信佛大臣或主苯官员被流放到偏远的地方，如信佛的巴·塞朗在苯教得势时就被流放到了芒域，风头过后才被招回。还要说明一点，就是苯教虽

① 《册府元龟》卷九八0《外臣部·通好》。

② 苏晋仁编《通鉴吐蕃史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3页。

③ 《旧唐书·吐蕃传》（上）。

④ 巴·塞朗著，佟锦华、黄布凡译注，《巴协》，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6页～10页。

然受到不断的打击，其游历活动丝毫不减于前一时期。

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看到，在这些迁徙、迁移、旅行、游历活动中，吐蕃的主动性大大增强了，其组织性、规律性提高了。从文化资源来讲，这些旅游活动带来周边地区先进的文化信息，也带去了吐蕃文明的信息。下一阶段，基于文化建设为目的的旅行活动就迅速成为主流。

第二阶段，9 世纪中期至 13 世纪中期。这个阶段的特点，是自发的僧人游学活动猛增，而游学又几乎全是以去印度、尼泊尔为最高目标，佛教徒游历就成为这时期旅游活动的主流，而战争、官方交聘往来游历这些曾盛极一时的旅游活动，就不常见于历史记载了。

吐蕃一朝，连年争战，到牟尼赞普时，已经出现师老将疲、民穷财尽的局面。[①] 再经下一个世纪的奴隶起义，以军事实力为后盾，雄踞亚洲一时的吐蕃终于崩溃。这种辉煌的经历，是在没有强大文化支持的情况下发生的，他可以在军事上称雄一时，但在文化内涵上与周边民族相比，相距甚远。当时中原文明、西面的伊斯兰文明、南面的佛教文明，都比建设中的吐蕃文明高。因此，军事扩张一过去，渴求和平的人们就开始了文化建设工作。文化资源差异导致域上张力，是佛教徒游学的根本原因。他们希望借此缩短或是消除这种差异。

总的说来，佛教僧人在居和游的方式上，有如下模式：

1. 先游后居模式。早年游学各地，待到学成后，就在一定的地方，选择寺庙定居，传学授徒。如香巴噶举派创始人克珠·琼波南交（978 年～?），“前半生走遍了尼泊尔、印度的各大佛教圣地，遍访名师，学得广大精深的许多密法，成为密教通达

①参见：藏族简史编写组编：《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 95 页。

者。”后来主要在南木林县香地，倡建香相等寺 108 座，接纳徒众数万人。① 又如 12 世纪，巴戎噶举创始人巴戎巴·达玛旺秀早年从林周彭波到岗波游学，师从岗波巴，成为殊胜通达者，后来就在后藏昂仁度甫修建巴戎寺，住在那里传教授徒，直到晚年。②

2. 终生游历模式。代表人物是噶举派第二代大师米拉日巴（1040 年～1123 年）。他很小就离开家乡阁润，去学习咒术，后皈依佛法，于各地游方求学。 38 岁时到曲切城师从玛尔巴。中间去洋日娥地方见楚峨求学，曾在达那普闭关修行。 45 岁回乡探亲，已无家可归，悲愤之下，去了阿里，隐迹潜修，历时 9 年，证得最胜悉地，“从此下山云游，以道歌形式宣扬教义，”在甄区圆寂。③ 又如 12 世纪时的却勒朗结，生于阿里，少年时外出游学，遍游前后藏诸辩场，后到觉谟朗寺求学，曾任觉谟朗寺主， 5 年后去前藏，游历察邬岭寺、雅隆登第，回后藏，在色喀穷安住。④

3. 时游时居模式。这种模式有一定的根据地，游学以它为回归点。萨迦二祖索南孜摩， 17 岁以前从父学经，此后到前藏桑普寺游学，达 10 年之久，26 岁回萨迦，任主持 3 年，其余时间到处学法求教，年 41 岁逝世。⑤

4. 居而不游模式。以萨钦·衮噶宁波（1092 年～1158 年）为典型。他幼时于父前学习藏文和佛法， 11 岁其父去世，乃从

① 杨贵明、马吉祥编译：《藏传佛教高僧传略》（下简称（高僧传》，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84 页～85 页。
② 《高僧传》,第 105页。
③ （高僧传》,第 89 页～92 页。
④ （青史》,第 509 页～510 页。
⑤ （高僧传》,第 64 页～65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主持喇嘛学习，20 岁为萨迦寺主，到 67 岁去世前一直主持该寺。①这种模式并不多见。

5. 居游模式。僧人成名后，受托主持多寺，从寺到寺，是游；而每到一寺，则是寺主，算不上游方。噶当派拉·卓微衮波（1186 年～1259 年），16 岁到切咯库窝处，受优婆塞戒，受具足戒后，一度主持库窝寺达 27 年之久。在此期间，各地纷纷将寺院献给他管理，达 34 座以上。后来桑波且寺、绒孜噶寺等又归他管理。②

再说与印、尼两地的交往。去印、尼乃至喀什米尔游学，成为一时风气。最早是耶歇斡派出 21 人去喀什米尔留学，后来则有雪敦·多杰绛称，经数次努力才去了尼泊尔，学成后回萨迦译书。而洛卓敦巴于 13 世纪时，曾 7 次去尼泊尔。③ 享有声名的卓弥译师，先后游学尼泊尔、印度，在印度东部学习了 4 年，在尼泊尔南方住了 13年，再返回西藏。④

要作跨文化区域的旅游，语言成了必须的工具。而藏僧们都能很好地处理这一问题，如卓弥等人去印度，先在西藏学了一些毗哇尼语，到尼泊尔后，再学印度语，然后去印度。这样一路旅途就通行无碍了。

印度、尼泊尔和喀什米尔不断有佛教大师来藏游历传播佛法。据成书于 1322 年的（布顿佛教史）记载，从吐蕃时期的静命（寂户）开始，到根底班智达为止，来西藏的印度或尼泊尔班智达就有 93 人。而从吞米·桑布扎开始到耒贝洛卓为止，有名的译师就有 192 人，其中不少是从印度或尼泊尔来的，如扎米桑杰

①《高僧传》，第 63 页。
② 《高僧传》,第 58 页。
③ 《青史》,第 514 页～515 页。
④《青史》，第 137 页～138 页。

乍等。[1]这当中，除赫赫有名的阿底峡外，其他如南印度人当巴桑杰，先后 5 次到西藏，在前后藏南部传了各种修法，传出息结派、觉域派等。相传他晚年曾到内地五台山朝圣，内地僧人在他圆寂后，还刊印他的画像，四处流通。[2]米拉日巴弟子热琼巴 15 岁时得病，就是三名印度游方僧人将他带到印度，颂修后才痊愈。[3]有的印僧来藏后，因施主死去，自己又不通藏语，就流落在藏地，替人牧羊为生。[4]

1207 年，印度学者绰切尕哇等 30 多人听说萨班名声，就从印度前来与他辩论，双方辩于济咙，论辩长达 13 天，绰切尕哇等人承认失败，自愿归于萨班门下。这事说明藏传佛教已经站稳了脚跟。经过数代人二三百年的努力，终于自成体系。从此他们不用大规模地游学印度了。虽然衮噶·罗追坚赞（1299 年～1327 年）在 1322 年还迎请印度大智者和大译师来藏翻译经典，廓诺·迅鲁伯于 14 世纪早期还去尼泊尔和印度游学，但已经不是主流了。

军旅见于记载的很少。吐蕃王室瓦解，其后裔分散于西藏各地，自山南至阿里的广袤土地上都有。阿里王耶歇斡曾率军去新疆援助当地佛教徒，解救伊斯兰军队的围困。 1239 年，蒙古军队在达尔汗台吉带领下，进军到当雄、热振一带。

第三阶段，13 世纪中期至 19 世纪中期。在元朝、明朝、清朝时期，各派游历的僧人开始多了起来，当时权力集中在中央朝廷，因此，到内地去游历，多半带有权力倾向。这是元朝萨迦、

① 布顿·仁青竹著：《布顿佛教史》（藏文），中国藏学出版社，1988年，第206页～211 页。

② 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第 173 页～174 页。

③ 《高僧传》，第 95 页。

④ 《高僧传》，第 29 页。

噶举两派显赫一时的原因所在。

公元 1244 年，63 岁的萨班带着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开始漫长的旅行，前去觐见蒙古王子阔端。 1246 年，他们到达甘肃凉州，表示愿意归顺蒙古大汗。从此，各派僧人开始了遥远的朝觐皇帝的旅程。

从 1276 年八思巴任忽必烈帝师开始，到 1362 年喃加巴藏卜任帝师，萨迦派总共有 14 人长途跋涉，到元朝廷担任帝师。①

第四世噶玛巴若必多杰 19 岁时（1358 年），从楚普寺起身赴京，经噶曲、察昌纳波、木雅饶岗（今康定县）、甘青一带，于 1359 年到达青海夏宗寺，1360 年到达帝都，受到崇敬，并开始讲经传教。后来他要求回藏，元帝悲泪挽留。直至 1365 年才得到诏书，起程西上。②

明朝时，噶玛巴黑帽五世经过长途跋涉，于 1406 年抵达南京，于 1408 年返回西藏，第八世曾由明武宗招去京城。 ③ 第十二世绛曲多吉和红帽系第八世于 1731 年一起受到雍正帝之召到北京，次年在京城圆寂。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1543 年～1589 年）受招，在赴京途中于蒙古地方圆寂。

历代喇嘛朝贡，当数明朝最盛，但清朝对喇嘛朝贡的规定与管理较之前代更系统化、制度化和专一化。 1648 年（顺治五年），阐化王舒克等谴使锁南必拉式（bsod－rnams－bkra－shis）率一千人贡方物，顺治帝封其为“妙胜慧智灌顶国师”，并赐诰命，令舒克等三年朝贡一次，每次以百人进贡，但只许十五人进京，其余留边，以为定例。④

① 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 96 页。
② （高僧传》，第 113 页。
③ 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第 123 页。
④ 苏发祥：《清代治藏政策研究》，民族出版社， 1999 年，第 174 页～175 页。

清代，自五世达赖喇嘛后，有六世班禅进京。1779 年 6 月，六世班禅率众二千余人，从札什伦布寺起程，经羊八井入青海，于塔尔寺过冬，次年 7 月 21 日到达承德，11 月 2 日于北京黄寺患天花，治疗无效圆寂。据西方传教士古伯察于 1845 年的记载，1840 年以前，西藏地方政府每年向北京派遣一个朝贡团。由于 1840 年和 1841 年两次朝贡，都遭到土匪的抢劫，所以皇帝下诏，使团进京改为每三年一次。①

另一方面，各级官吏往来的游历活动，从中央到地方，也构成这一时期旅游活动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其中，元朝多次派官员到西藏进行人口调查。明朝政府派员前来封赠、传布诏令。清廷甚至将驻藏大臣定期进行改换的，就达 100 多人。这些官员每隔一定时间，就会奔忙在迢迢万里的驿道上。

不过，此时期游历活动的主体，是区内游学讲经传教。宗喀巴（1357 年～1419 年）的一生就是这种游历的缩影和集中体现。下面是他入藏后的旅程：

1372 年 16 岁　　自青海赴卫藏，从南路经昌都入藏，用时近一年。

1373 年 17 岁秋，到直贡寺；结伴西行，经贡塘，至涅塘。入第瓦巾寺，住两年。

1375 年 19 岁　　去桑普寺辩经，之后路经江孜、夏鲁、纳塘去萨迦，转去萨桑寺。此后，回萨迦立宗，再去拉垛绛、觉朗寺、薄东蔼寺，回纳塘寺，住江孜乃宁寺。

1376 年 20 岁夏，住江孜孜钦寺。秋，与仁达瓦赴江孜桑丹林寺；秋末，自娘垛赴拉萨；冬，住第瓦巾寺。

1377 年 21 岁　　到觉摩垄寺，后去拉萨西北的垛垄朴，拟

① 古伯察：《鞑靼西藏旅行记》，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 年，第 451 页～452 页。

赴萨迦，途中因严寒于乃宁寺避冬。于此寺首次讲经。

1378 年 22 岁春，经纳塘到萨迦。

1379 年 23 岁　　与仁达瓦至昂仁寺度春夏，秋，经萨迦回前藏。自拉萨东归乡里，中途而止。冬，住第瓦巾寺。

1380 年 24 岁　　至纳塘寺；秋，去薄东蔼寺；随仁达瓦去萨迦寺。

1381 年 25 岁春，回前藏，于贡塘、桑朴、孜塘诸寺答辩。

1385 年 29 岁　　于泽当南结拉康受比丘戒，后去丹萨替寺。

1386 年 30 岁　　往闻地等处，次去蔡寺（蔡贡塘）。

1388 年 32 岁冬，离蔡贡寺，住第瓦巾寺。开始戴黄帽。

1389 年 33 岁春，赴达布东南的贾域，事毕回蔡寺。再住觉摩垄；夏，住第瓦巾寺，冬住垛垄。

1390 年 34 岁　　赴吉隆、达仓。后到却垄；秋末，至第钦（江孜）。

1391 年 35 岁　　住在白朗宗附近的赤杂康。

1392 年 36 岁春，还第钦。

1393 年 37 岁　　往朝精其(在阿喀宗)。

1395 年 39 岁　　赴罗扎(约羊卓雍错东南)。

1396 年 40 岁　　由罗扎赴罗热（约贾域宗西南）；往朝洛瑜之杂日山。

1397 年 41 岁　　春夏，住涅地。

1398 年 42 岁　　至阿喀。

1399 年 43 岁　　正月至精其，夏安居于当多寺（娘布），秋，回拉萨，住布达拉宫。

1400 年 44 岁春，于拉萨正西之噶瓦栋讲经，冬，去热振寺。

1401 年 45 岁　　赴直贡寺,再返热振寺。

1404 年 48 岁　自热振寺赴闻地第钦项寺，然后赴阿喀绛巴林寺。

1407 年 51 岁　自阿喀到拉萨，住色拉却顶。

1408 年 52 岁　移住热喀岩窟，秋初，赴种不垄。

1409 年 53 岁　住拉萨,传召,建甘丹寺。

1410 年 54 岁　为甘丹寺开光。

1411 年～1414 年 55 岁～58 岁　闭关，或在病中。

1415 年 59 岁夏，安居于闻地，然后还甘丹寺。

1416 年 60 岁　为哲蚌寺加持地基，建羊八井殿于甘丹寺。

1418 年 62 岁　住甘丹寺。

1419 年 63 岁　自甘丹寺往垛垄温泉。10 月 25 日圆寂。

宗喀巴创立了格鲁派。宗喀巴 39 岁时，意欲赴印度游学，迟疑未决。南喀坚赞劝阻了他，宗喀巴终于没有去印度游学。此前，西藏形成的较大派别，如噶当、宁玛、噶举和萨迦，都或多或少与来藏的印度、尼泊尔和喀什米尔僧人游方有关，或者创派的若干祖师本身就曾去这些地方游学。宗喀巴没有与南边来的僧人直接交流过。这表明，这时只在藏区内部游学，就已经能推进文化的建设并发展它了。

藏僧大量地在广大的文化区域和地理区域上游学、流动，直接推动藏文化的建设。在这种大幅度的流动下，藏文化产生了什么与此紧密相连的特点？德国哲学家康德在长达三十多年的讲课中认为，扩大对人类（学）知识的范围的手段包括旅行以及阅读游记。① 美国社会学家帕克说：（人口）“‘流动’这个概念，就像其对偶概念‘孤立’一样，包括了很广阔的范围内的一些现象。”“所谓原始人类不善于运用抽象概念，这同他们不流动有密

①康德著、邓晓芒译：《实用人类学》，重庆出版社，1987 年版，第 2 页、221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